



经济管理学术文库·管理类

代理冲突及其 制度渊源、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

Agent Conflicts and its Institutional Origins, Audit Firm Size and Audit
Qua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吴昊旻 /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0YJC790279)的结题成果
石河子大学“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重点建设项目、石河子大学“211建设一流学科”项目资助



经济管理学术文库·管理类

代理冲突及其 制度渊源、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

Agent Conflicts and its Institutional Origins, Audit Firm Size and Audit
Qua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吴昊旻 /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代理冲突及其制度渊源、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吴昊旻著.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096 - 3986 - 3

I. ①代… II. ①吴… III. ①上市公司—审计—研究—中国 IV. ①F239.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2658 号

组稿编辑: 曹 靖

责任编辑: 杨国强 张瑞军

责任印制: 司东翔

责任校对: 张 青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 www.E-mp.com.cn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 × 1000mm/16

印 张: 10.75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96 - 3986 - 3

定 价: 4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前 言

本书在我国政府推动主导的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战略的政策背景之下，从企业（事务所及其客户公司）代理冲突及其制度渊源（市场竞争结构、法律风险环境、政府干预等制度背景影响）的宏微观视角，多维而系统考察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质量”关联以及事务所规模如何才能发挥其正向保障效应的环境前提，在国际大所的审计质量“神话”不断破灭以及国内所林立竞争的大趋势下，试图为我国目前或已经坚持已久的由政府而非市场推动主导的事务所规模扩张战略提供一些借鉴与反思。本书基于“两大方面、八大视角”的文献梳理以及经由可挤占准租（AQRs）视角的博弈分析与理论透视发现，事务所的“规模—质量”正相关的基本结论仍然成立，这与主流研究的结果一致。但是，正如诸多文献资料指出的那样，事务所“规模—质量”的正相关结论，是基于产品市场的充分竞争、有效的审计监管、足够的法律威慑、适度的政府干预、及时的信息披露以及忽略事务所内部代理问题等一系列市场条件或环境前提之下而得出的，而这些环境前提要么尚不完备，要么还存在明显的国别/地区制度背景差异。本书从利益博弈即“可挤占准租”（AQRs）的视角对事务所的“规模—质量”效应进行理论分析，进而很自然地纳入产品市场竞争（PMC）、诉讼/惩戒风险、政府干预等利益攸关之外部环境的影响（涉及事务所、竞争对手、客户、政府等利益相关主体），以及事务所自身或审计行业特征的影响（如资产专用性），有助于纵深透视事务所的“规模—质量”关系及其正向保障效应的宏微观环境前提。与上述分析相对应，本书有效整合已有研究的视角与路径，从影响高质量审计的供给（S）与需求（D）及其公司治理效应（CG）的一些关键制度



环境 (I) 的纵深分析出发,进而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范式,即考虑制度背景 (I) 之系统影响下的产品市场竞争环境 (PMC)、诉讼风险水平 (L)、高质量审计需求 (D) 和供给 (S) 及其公司治理效应 (CG) 之间内生互动关联的 “I - P/L - D - S - C” 范式。

然后,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本书对事务所的 “规模—质量” 关联进行了多维而系统的实证检验。首先,本书基于 2000 ~ 2012 年我国沪深 A 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样本,从企业所在产品市场竞争 (PMC) 的中宏观视角,同时结合我国最为典型的制度背景即政府管制的系统性影响,对事务所 “规模—质量” 关系予以纵深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予以实证考察。研究发现:事务所规模与其审计质量正相关,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有助于促进高质量审计需求及其供给,但产品市场竞争 (PMC) 对于事务所 “规模—质量” 正向关联的积极强化作用即产品市场之 “竞争效应” 尚未有效发挥甚或尚不存在;政府干预对高质量审计供求具有 “双向影响”,而政府管制通过 “异化” 产品市场竞争效应并进而显著弱化事务所 “规模—质量” 正向关联的 “负向效应” 显然占据主导,这意味着政府干预或已趋于 “过度”,政府管制是导致公司高质量 “审计内需” 不足及其供给乏力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效应在民营公司以及 2006 年确立风险导向审计模式、股权分置改革以及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的子样本中更为显著。本书研究表明:我国的市场竞争环境仍很滞后,在合理保持政府积极主导作用的同时,应着力于营造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的公平竞争环境,让市场的充分竞争成为刺激我国公司高质量 “审计内需” 的主导力量。形成高质量审计的 “需求拉动” 效应是我国审计市场治理的关键。

更好的法制环境下,更高的诉讼/惩戒风险压力是推动高质量审计供求的有效力量及其环境前提,诉讼/惩戒风险的高低显著影响事务所 “规模—质量” 关联及其政策效果。在基于产品市场竞争 (PMC) 视角的考察之后,本书又从诉讼/惩戒风险及其环境压力的视角 (基于 2003 ~ 2012 年沪深 A 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样本) 对事务所 “规模—质量” 关联予以分析与检验。研究表明:事务所规模 (Big N) 与其审计质量 (abs J、abs K) 正相关的一般结论仍然获得支持;与诉讼/惩戒风险 (LR) 尚无显著促进效应不同,法制环境 (Law) 的提升有助于强化高质量审计供给;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与审计质量正相关,但企业层面代理冲

突对于事务所“规模—质量”正向关联的积极促动效应尚不明确，集中的股权/控制权结构下我国上市公司对于（大所）高质量审计的引入动机依然审慎；但整体看诉讼/惩戒风险（LR、Law）对于事务所“规模—质量”正向关联以及在促进代理冲突严重的公司有动机引入大所高质量审计方面的积极强化效应尚未凸显；事务所“规模—质量”正向关联以及诉讼/惩戒风险对于审计质量的威慑效应在民营企业及2006年确定风险导向审计模式后的样本中相对更显著；在促进（大所的）高质量审计方面，政府干预与法律风险呈现出相互替代的效应；低法制环境下政府的有效监管可在一定程度或阶段上弥补法制治理效应的低效甚或缺失，我国由政府主导推动事务所扩张战略虽有其积极意义，但还须谨防其“过度”。本书的研究为新时期我国由政府而非市场推动主导的事务所规模扩张战略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和战略反思。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研究的思路	3
第三节 主要结论及贡献	4
第四节 研究的框架安排	7
第二章 相关研究	
——文献及其启示	8
第一节 代理冲突、组织规模与审计质量：内生关联的理论基础	10
第二节 代理冲突（宏微观）、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正相关的 “间接证据”	13
第三节 代理冲突及其制度渊源、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正相关的 歧义	19
第四节 本章总结	31
第三章 理论模型	
——基于可挤占准租（AQRs）的分析	33
第一节 关于可挤占准租（AQRs）	33



第二节 Chung 和 Kallapur (2003) 关于“价值—质量”的审计质量	
博弈分析	36
第三节 基本命题	42
第四章 产品市场竞争 (PMC)、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	
——来自中国审计市场的经验证据	44
第一节 引言	44
第二节 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46
第三节 研究设计	56
第四节 实证结果及分析	59
第五节 本章结论	97
第五章 诉讼风险 (环境)、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	
——来自中国审计市场的经验证据	99
第一节 引言	99
第二节 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01
第三节 研究设计	109
第四节 实证结果及分析	113
第五节 本章结论	137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139
第一节 研究结论	139
第二节 政策启示	142
第三节 不足与展望	144
参考文献	147
后记	163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本书在我国政府推动主导的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战略的政策背景之下，从企业（事务所及其客户公司）代理冲突及其制度渊源（市场竞争结构、法律风险环境、政府干预等制度背景影响）的宏微观视角，多维而系统考察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质量”关联以及事务所规模如何才能发挥其正向保障效应的环境前提，在国际大所的审计质量“神话”不断破灭以及国内所竞争林立的大趋势下，试图为我国目前或已经坚持已久的、由政府而非市场推动主导的事务所规模扩张战略提供战略借鉴与反思。这是本书研究的“现实”起点，而对于某一重大问题的研究，既要植根于对现状或现实背景的反思，也须针对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及其结论分歧进行对比、辨析和理论的透视。所以，本书研究的逻辑起点为：基于我国特定制度背景下的审计市场的现状反思，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及其分歧，首先将代理冲突、事务所规模、审计质量三个命题及其内在关联予以独立审视，然后结合特定的制度环境差异分析，从代理冲突及其制度渊源的宏微观互动视角，为事务所“规模—质量”的正相关及其“歧义”（条件正相关、不显著甚或负相关）结果提供多角度的文献支撑、深入的理论透视以及基于产品市



场竞争 (PMC)、诉讼/惩戒风险环境压力 (包括法律风险与行政处罚)^① 和政府干预之系统性影响的多维度实证检验。

首先,基于对国内外审计市场现状以及制度背景差异的反思与概观。自 DeAngelo (1981b) 的经典研究之后,事务所规模成为审计质量的基本表征。但从 2001 年以来,欧美知名大公司发生的一连串财务舞弊案,却无不与独立审计师尤其是国际大所 (Big N) 的审计质量表现息息相关。与此同时,国际大所在中国审计市场上的形象也开始因一系列审计失实事件而频遭质疑。内外相和,国际大所规模决定质量的神话几近破灭。事务所规模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审计的高质量? 规模经济、声誉约束、资产或准租抵押效应等经典解释何以乏力? 国内所的审计质量又该如何改进? 诸多诘问再次成为学界反思、热议的话题。然而,与国外对“规模—质量”效应的冷静反思不同,国内反应似乎正与上述质疑“相反”:从政府 (财政部、央行、证监会、中注协等) 到事务所层面,则开始“伺机”推动以做大做强、提高国内所竞争力为主要目标的规模化扩张。据中注协相关数据显示:经两次规模化浪潮推动,与上市公司数量激增相反,符合资质的国内所从 1999 年的 106 家锐减到 2007 年的 64 家,国际“四大”市场份额由 2006 年的 6.93% 降至 2007 年的 6.2%,而国内的“十大”所则提升至 2007 年的 37.6%,后文实证部分的描述性统计显示 2003 ~ 2010 年的均值已经超过 34%,市场份额与业务收入增长率等均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增幅渐超国际“四大”;审计质量市场认同度的国内外差距亦呈缩小趋势。这反映出国内大所随着规模递增有改善审计质量的动机与成效,但结合国际大所的审计质量“泡沫”,同时似乎亦间接“印证”(国际大所审计质量的下滑) 规模可能不是决定审计质量的根本性因素。

那么,在此背景下,我国由政府而非市场推动主导的事务所的规模扩张究竟具有多少理性意义? 要使规模发挥正向保障效应,还需要哪些基础性条件或治理环境作为前提? 本书基于代理冲突及其制度渊源分析的宏微观视角,从来自正反

^① 考虑到法制环境依然相对滞后、政府干预频繁的特殊制度背景,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至今面临的民事诉讼案件依然非常稀少,而政府的行政处罚往往在审计舞弊事件的惩戒或惩处中扮演主要 (替代) 角色 (Chan 和 Wu, 2011; Allen 等, 2005), 故本项目所谓的诉讼/惩戒风险 (LR) 环境包括了行政处罚风险以及法制环境 (Law)。



两大方面的文献证据、理论透视以及多维而系统的实证检验，试图揭示事务所规模何以“不足以”成为审计质量正向保障的深层原因，为我国由政府推动的、凭借事务所规模扩张以推进审计质量的政策选择提供反思的“明证”。这对于我国由政府推动主导的试图通过事务所规模扩张以快速提升国内事务所竞争力及其审计质量的“非市场化”导向，尤其具有重要的实践反思价值；对于从健全完善治理环境的角度进一步强化我国事务所的“规模—质量”保障效应、事务所的竞争优势及其行业专门化发展等战略的“市场化”基础，又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和路径启示价值；对于我国目前仍由政府主导而非市场竞争自然推动的事务所做大做强战略是否能够产生预期的“理想成效”，具有重要的战略反思价值，有助于充分理解十八大明确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政导向及其改革任务的重大意义。

其次，基于对已有研究分歧的全面梳理和理论透视。本书的前期研究基于“间接动力”、“直接动力”及其“作用基础”的理论透析，以及对国内外相关经验研究结论——正相关及其“歧义”的深入对比分析之后发现，在几乎一致的理论基础上何以出现结论分歧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学界往往“不自觉地”将代理冲突、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尤其是后两者杂糅或予以等同考量，即普遍简单以国际或国内大所（Big N）直接指代高质量审计，而这三个命题虽相关联却实应独立审视。而且，投资者、公司或管理层的高质量审计需求（D）亦存在显著的差异，不可等同视之。其二，现有研究对于特定的制度环境差异之影响的考察仍然失之轻率（吴联生等，2008），尚未深入系统关注特定的制度背景差异对于事务所“规模—质量”效应发生条件的潜在影响，而这势必导致结论的简单趋同。对于这些缺陷或不足尤其是结合制度背景特征的纵深研究，应该并已经成为现代审计理论研究或所谓“新制度审计学”未来发展的一个主流趋势。

第二节 研究的思路

本书基于代理冲突及其制度渊源分析的创新视角，首先从已有研究的分歧或



不足出发，从正反两大方面文献证据的全面梳理及其理论透视，来揭示会计事务所的规模何以“不足以”成为其审计质量正向保障的深层原因；然后，结合我国特定的制度背景，通过宏微观代理冲突、市场竞争结构、政府管制、诉讼/惩戒风险压力等制度环境特征的深入考察，为事务所“规模—质量”的正相关及其“歧义”（条件正相关、不显著或负相关）提供文献支撑、理论透视以及多维系统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为我国由政府推动的、凭借事务所规模扩张以推进审计高质量的“非市场化”政策导向提供反思的“明证”，为健全和完善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质量”保障效应、事务所竞争优势及其行业专门化发展战略等宏观治理环境即其“市场化基础”提供研究借鉴和路径启示。

基本研究思路及其逻辑关系如下：第一章旨在反思和概观已有研究的分歧及其制度背景差异，进而提出问题；第二章主陈国内外相关经验证据及其分歧，旨在通过研究现状的梳理以及与后文理论预期的对比分析，交代本书的研究关切即事务所的“规模—质量”关系“实际怎样”；第三章主析相关理论及其预期，提出基本命题，旨在揭示事务所的“规模—质量”关系“应该怎样”；第四章和第五章结合特定的制度环境，分别从产品市场竞争环境（PMC）和诉讼/惩戒风险及其环境压力的角度，同时考虑了政府干预等的系统性影响，对事务所的“规模—质量”关联进行多维的实证检验，旨在表明其关系“究竟还会怎样”的问题；第六章总括全文，得出结论。本书的研究内容层层推进，环环相扣，力求一以贯之。

第三节 主要结论及贡献

本书基于“两大方面、八个视角”的文献梳理以及经由“可挤占准租”（AQRs）视角的博弈分析与理论透视发现，事务所“规模—质量”正相关的基本结论仍然成立，这与主流研究的结果一致。但正如已有研究（DeAngelo, 1981b; Khurana 和 Raman, 2004; Francis 和 Wang, 2008）同时指出的那样，事务所“规模—质量”的正相关结论，是基于产品市场的充分竞争、有效的审计



监管、足够的法律威慑、适度的政府干预、及时的信息披露以及忽略事务所内部代理问题等一系列市场条件或环境前提之下而得出的,而这些环境前提要么尚不完备,要么存在明显的国别/地区制度背景差异。因此,还有必要深入考察事务所“规模—质量”关系的作用背景,尤其是必须深入考察政府干预、法治环境等“直接”影响市场竞争主体行为选择的制度环境性因素的系统性影响。本书基于产品市场竞争(PMC)、诉讼/惩戒风险压力(LR、Law)以及政府干预等系统性影响的中宏观视角,对事务所的“规模—质量”关联进行多维而系统的实证检验。基于研究结果,本书研究的主要结论有四个。

(1) 事务所“规模—质量”正相关的基本结论仍然成立,但事务所“规模—质量”正向效应的产生确有其环境前提(Khurana 和 Raman, 2004; 吴昊旻和王华, 2010a, 2010b),事务所规模本身并不能直接决定其审计质量的高低,故对于国内外学者相继发现的事务所“规模—质量”正相关“歧义”(条件正相关、不显著甚或负相关)的有效解释,必须诉诸或扩大所在国家/地区特定制度环境的系统纵深层面,基于欧美发达市场经济环境的“正相关”结论并不具备“超脱”制度环境差异的一致适用性。

(2) 审计质量由事务所的规模及其所在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法治环境(即事前约束和事后威胁)等多因素共同决定,抽象不同制度背景下的市场竞争与风险环境差异,很可能导致结论的趋同以及对审计质量差异现状的解释乏力;国际大所审计的高质量其实更多源于“被迫”,而诉讼风险环境压力的“倒逼”效应正是促成大所高质量审计的最主要动力;诉讼风险环境的“一国两制”导致国际大所相机调低其审计质量,并在相当程度上支持和解释国内外大所审计质量的市场认同度差异为何并不显著的质疑。与抽象法律/诉讼风险环境差异往往会导致“规模—质量”关系结论的趋同相类似,我国新兴/转轨经济背景下的产品市场竞争(PMC)以及公司治理环境(CG)的相对滞后,已成为国内外大所(Big N)“相机供给”高质量审计服务及其“规模—质量”正相关“歧义”的重要诱因。

(3) 市场竞争结构(PMC)显著影响审计产出,从而具有显著的“竞争效应”,而政府的干预或管制会“异化”产品市场竞争效应进而显著弱化事务所“规模—质量”正向关联,政府管制是导致我国公司高质量“审计内需”不足以



及其供给乏力的重要原因；忽视低法治环境下政府干预的系统性影响是引致国内外研究结论出现较大分歧的一个主要原因。

(4) 高质量审计具有显著的公司治理效应 (Jensen 和 Meckling, 1976; Fan 和 Wong, 2005), 但在我国审计市场普遍分散 (陈艳萍和杨淑娥, 2010)、企业间竞争亦日趋激烈、诉讼/惩戒风险 (环境) 压力偏低的现状之下, 高质量的审计供给 (S) 尚不足以主导甚或引导审计市场的公司治理效应 (CG), “刺激内需”即通过市场竞争力量引导和推动我国 (上市) 公司的高质量 “审计内需” (D) 是中国审计市场有效治理的关键。

本书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 与前文的相关研究述评以及考虑市场竞争等影响的博弈模型分析相对应, 本书有效整合已有研究的视角与路径, 从影响高质量审计的供给 (S) 与需求 (D) 以及其公司治理效应 (CG) 的一些关键制度环境 (I) 的纵深分析出发, 进而提出一种新的分析范式, 从而既有助于整合代理冲突及其公司治理与高质量审计之 “供求博弈” 关系研究的显著分歧 (动机强弱不同), 为 Jensen 和 Meckling (1976) 等关于代理冲突引致 (审计) 治理动机的论断, 提供了基于产品市场竞争 (PMC) 和诉讼/惩戒风险环境的可信传导路径; 也从产品市场竞争 (PMC)、诉讼/惩戒风险压力及其影响背景的系统新颖视角, 揭示和间接印证了 Fan 和 Wong (2005) 等关于东亚八国/地区 (包括中国) 的外部审计如何能发挥其显著公司治理效应 (CG) 的内在机理; 同时, 该范式亦为新兴/转轨经济背景下我国高质量审计的 “供求博弈” 以及审计市场的有效治理 (规范政府角色、优化产品市场竞争、持续完善治理环境) 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更为可行的路径, 即在推进我国事务所做大做强战略进程中, 应该更加重视市场竞争力量的自然推动,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以及诉讼/法律风险的事前威慑与事后倒逼效应, 而政府则应在确立并持续优化市场竞争规则等方面着力为 “国/民” 经济发展营造更为公平且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 (PMC)。

其次, 本书研究也为新兴/转轨经济背景下政府发挥其合理的监管功能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基于审计质量的差异化证据 (Chan 和 Wu, 2011; Fan 等, 2007; 诺斯, 1993)。在低法治环境下, 政府的有效监管可在一定程度上或在一定的阶段中弥补法制治理效应的低效甚或缺失 (替代效应)。我国由政府主导推动事务



所扩张战略虽有其积极意义,但还须谨防政府干预的“过度”。实际上,诉讼/惩戒风险环境(LR、Law)对于事务所“规模—质量”正向关联的强化效应尚未凸显,这很可能是因为政府干预产生的“替代效应”的抑制或抵消使然,也潜在表明我国审计市场中的政府干预已经趋于“过度”。政府干预作为最典型的非市场化力量,终非长久、优先之选,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国企治理改革,逐步营造和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化环境,始终是大势所趋,而这已经成为十八大以来我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重点。

第四节 研究的框架安排

除第一章为绪论外,本书研究内容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章为相关研究,主要从“两大方面、八个视角”对事务所“规模—质量”的正相关及其“歧义”(条件正相关、不显著甚或负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全面的梳理、辨析与理论透视,为以后的理论模型分析以及实证检验奠定文献基础;第三章为理论分析,主要基于“可挤占准租”(AQRs)的博弈模型分析,对事务所的规模如何能够成为其审计质量的正向保障的理论命题,提供基于利益权衡或策略性妥协等动机的作用机理分析;第四章基于产品市场竞争(PMC)的中宏观视角,系统验证事务所“规模—质量”的正相关关系及其环境前提,以及考虑政府干预系统性影响下的产品市场竞争(PMC)在事务所“规模—质量”关联中的影响效应(即“产品市场竞争效应”);第五章基于诉讼/惩戒风险及其环境压力(包括法律风险与行政处罚)的视角,对事务所“规模—质量”关系及其环境前提予以纵深检验,同时亦考虑了政府干预的系统性影响;第六章为本书的研究结论及启示,旨在总结全文,主要围绕实证检验得出的具体结果,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得出本书的研究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书研究的政策启示,同时指出本书研究存在的不足。

第二章 相关研究

——文献及其启示

如开篇引言所述,自 DeAngelo (1981b) 的经典研究之后,事务所规模成为审计质量的基本表征。但自 2001 年以来,欧美知名企业的一连串财务舞弊案,却无不与国际大所 (Big N) 的审计质量下滑相关;与此同时,这些国际大所 (Big N) 在中国审计市场上的形象也因其一系列审计失实事件而频遭质疑。内外相和,国际大所 (Big N) 审计质量“神话”几近破灭。事务所的规模与其审计质量的“分离”及其约束条件等深层次问题,日益成为国内外学界及实务界反思、诘问和热议的焦点 (Lennox 和 Pittman, 2010)。但与国外学界及实务界对“规模—质量”关联效应的冷静反思不同,我国政府及实务界的反应近乎“逆流而上”:从政府到事务所层面,则开始“伺机”推动以做大做强、提高国内所竞争力为主要目标的规模化扩张。中注协于 2011 年 7 月 28 日审议通过的《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规划 (2011—2015 年)》的发展目标仍然强调要深化落实事务所做大战略,统筹推进事务所做强做大和做精做专。中注协统计数据显示:经过两次规模化浪潮推动,与上市公司数量的激增相反,符合资质的国内所从 1999 年的 106 家锐减到 2007 年的 64 家,国内“十大”的审计市场份额已提升至 2007 年的 37.6%,而国际“四大”市场份额则由 2006 年的 6.93% 降至 2007 年的 6.2%;审计质量市场认同度的国内外差距亦呈缩小趋势。这表明国内大所随着其规模的递增已有改善其审计质量的动机与成效 (Fan 和 Wong, 2005; Chan 和 Wu, 2011),但 (国际大所审计质量下滑) 同时亦可至少间接“印证”规模可能不是决定审计质量的关键要素 (刘峰等, 2009; 王咏梅和邓舒文, 2010)。



Khurana 和 Raman (2004) 的研究也指出, 事务所“规模—质量”正相关的结论, 是基于审计市场的充分竞争、有效的审计监管、足够的诉讼风险压力、及时的信息披露机制以及忽略事务所内部代理问题等一系列前提之上而得出的, 而这些前提还具有明显的制度环境差异 (吴昊旻和王华, 2010a, 2010b)。

那么,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国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的事务所规模扩张战略是否理性? 要使规模发挥正向保障效应, 还需要哪些基础条件或治理环境作为前提? 本书基于代理冲突及其渊源 (企业所有权结构及其所在的市场与制度环境) 分析的系统性视角, 首先从来自正反两大方面的理论分析和文献证据——又区分了来自“共同面”和“差异面”的经验结果以揭示事务所的规模如何“不足以”成为审计质量正向保障的原因及其机理, 以期为我国由政府推动和主导的、凭借事务所的规模扩张以推进其审计质量竞争力的政策取向和策略选择提供反思的“明证”, 而这些反思, 正是本书后文的理论分析以及实证检验的逻辑基础, 故此着墨甚多。

本章主要从客观、超然的角度, 遵循“组织规模—代理成本”相关关系的分析路径, 即组织 (事务所/客户) 规模扩张会加剧代理问题, 通过约束规模或能有效抑制代理冲突, 并因而可以有力地推动事务所与客户公司对于高质量审计的有效供给与需求; 同时基于声誉假说、“深袋”理论 (Deep Pocket)、交易成本或可挤占准租理论 (Appropriable Rents) 以及不完全市场等经典理论视角, 为在声誉及剩余损失等事前/事后威慑机制的作用之下的事务所“规模—质量”可能正相关的结论或预期, 即专用性资产投入更多的大所更愿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而大规模客户因其代理冲突相对更为严重, 故也更愿引入符合资质的 (大所) 高质量审计, 提供来自多元视角的理论和文献基础; 并由此形成与审计的有效供给及需求相对应的高质量审计的直接 (内生) 与间接 (外生) 动力。本章可为后文的经验研究结果提供理论和经验参照, 并为后文的理论分析 (建模) 以及相关的实证检验奠定文献基础。

本章分为如下三层, 即基于代理冲突视角, 首先分析和反思事务所“规模—质量”内生关联的理论基础 (又略分三节), 其次梳理事务所“规模—质量”正相关的“间接证据”, 最后从代理冲突及其制度渊源的系统性视角, 分为五大维度, 从文献证据的视角进一步揭示事务所“规模—质量”的“正相关歧义”。